

# 六朝时期的玉容器\*

褚馨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市 200433)

关键词: 六朝; 玉器; 樽; 卮; 容器

摘要: 本文对六朝墓葬中考古出土的玉容器作细致分析及系统考证, 希冀通过这样的整理对六朝玉器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并建立起六朝玉器的某些时代特征。

Key Words: Six Dynasties Period; jades; zun drinking cup; zhi wine container; vessels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makes a meticulous analysis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jade vessels unearthed from tombs of the Six Dynasty Period with the purpose of getting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n jade artifacts and summing up their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六朝出土的玉器中, 容器是一个重要种类, 不乏琢制精美及玉料上乘者。它的使用延续了战国、秦汉以来的玉容器功能, 亦有自身的时代特征。虽然目前为止出土数量屈指可数, 但对其深入分析和研究后, 仍能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 一、刘弘墓的“樽”与“卮”

### 1. 玉樽

湖南安乡西晋镇南将军刘弘墓出土了一件精美的玉容器<sup>[1]</sup>, 通高 10.6 厘米, 口径 10.5 厘米, 壁厚 0.4 厘米, 筒形, 平底, 口径与器高接近, 附双铺首衔环, 器足为三只跪熊, 造型生动, 拱肩以承器身。(彩版二, 1、2) 器表则雕刻丰富多样的图案, 呈现出丰富的视觉效果: 有三道凹带纹, 将外壁的浅浮雕分为上下两段, 如将环绕一周的纹饰铺展, 将会是两段故事连续、颇具可读性的画面。上段分布两个对称的兽面衔环铺首, 依次为: 铺首→一头戴胜冠, 羽翅, 右襟, 盘坐于海水撑起平台上的人物形象, 呈合掌冥想状, 据特征分析应是西王母形

象<sup>[2]</sup>→海水纹→一侧面人像, 面向西王母, 做祷告状→海水纹→两只仰天飞腾的螭虎, 右螭虎抬起前爪踢左螭龙的下颚→铺首→三只形态各异的螭虎, 有仰天长啸、倒挂翻腾, 爪间相搏。下段的纹饰同样精彩纷呈, 分为三组相互争斗的内容: 一组为头上长角的熊状走兽从海浪中钻出, 与一正面螭虎对峙; 一组是头上长角的侧面螭虎, 隔着海水纹与另一只手舞足蹈的熊对决, 熊的形象令人忍俊不禁, 屈膝马步, 低首张嘴, 双手做举哑铃状, 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所藏玉板饰上的熊形象非常相似<sup>[3]</sup>; 另一组图案是羽人手执瑞草, 与一龙搏斗, 龙爪正抵住瑞草。

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在《考古图》中将这类用玉或(鎏金)铜制作的器物称为“卮”<sup>[4]</sup>。这一误说沿袭甚久, 直至 1962 年山西右玉县两件自铭“温酒樽”的出土, 为此进行了正名<sup>[5]</sup>。右玉县鎏金铜樽通高 25 厘米, 口径 23 厘米, 底下三熊足, 腹部两侧有对称铺首衔环, 带盖, 器表雕铸虎、牛、羊、猴、龙、骆驼等十余种动物纹样,

\* 本研究获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 特此鸣谢。

其造型、装饰均与刘弘墓玉容器相近。(彩版二, 3) 铜樽的口沿及盖下子唇外沿均刻有隶书铭“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二”。学者对铭文考释后认为这类樽器并非字面上的“温酒”之用, 而是盛放美酒的容器<sup>[6]</sup>。这一考证亦得到其他出土物的支持, 1972年河北邯郸张庄桥村1号墓出土的鎏金银嵌宝石铜樽造型与山西右玉县樽一致, 并带托盘, 托盘上有铭文“建武廿三年, 蜀郡西工造乘舆大爵酒樽”, 表明该类器物的确切名称为“酒樽”<sup>[7]</sup>。

樽的早期文献记载, 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吴王阖闾用银樽与金鼎、玉杯等宝物随葬爱女<sup>[8]</sup>。所见出土实物较早的是湖北楚国江陵望山2号墓一件战国中期的错金银龙凤纹铜樽<sup>[9]</sup>, 美国哈佛大学美术馆温索浦(Grenville L. Winthrop) 玉器收藏中有据传出自洛阳金村古墓的玉樽<sup>[10]</sup>, 金凤立于器盖之上, 是一件金玉结合、美轮美奂的艺术品。(彩版二, 4) 除盛放美酒外, 这类樽器是否有着其他用途? 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东室出土的两件错金铜樽<sup>[11]</sup>, 其中一件器内盛放着鸡肩胛骨, 鸟喙骨及肱骨、股骨、胫骨等兽骨, 说明当时的樽器还可用于盛放肉类食物。

考古材料显示, 樽在东周时期制作已臻成熟, 在汉墓中继而广泛出土, 并有各种材质, 最常见为陶/釉陶、铜、漆等, 工艺上有错金银、鎏金、嵌宝石等各类手法<sup>[12]</sup>。从装饰朴素的平民用品, 到甚费工巧的贵族器物, 樽在汉代是一种广为流行的酒容器, 东北的乐浪郡(今朝鲜平壤)亦出土这类青铜器<sup>[13]</sup>。(彩版二, 5) 作为酒器, 完整的樽应该有盖, 并与承盘、勺一起配套使用, 因为汉代的酒通常贮藏在瓮或壶中, 饮宴时须先将酒倒入樽内, 再用勺酌入杯中, 供宾主享用<sup>[14]</sup>。(彩版二, 6) 公元3世纪的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出土了一套陶樽用器, 有樽、三足盘及勺<sup>[15]</sup>, 而在山西大同

沙岭北魏墓葬壁画中仍可以看到这类饮酒组合: 宴饮场景中, 酒樽与食物放在一起, 樽内置一长勺, 旁则置酒杯等物<sup>[16]</sup>。上述发现说明这种三件套的饮酒具在魏晋南北朝仍有延续。

根据对出土物的总结, 可将樽的基本形制定为: 筒形, 平底, 三足, 两侧有环钮(方便提携), 带盖或带托盘, 精美者则在器壁或盖顶刻饰博山、仙人、四灵及瑞兽祥禽等纹样。体型之大小视材质的不同而各异, 通常高在20~30厘米之间, 口径与高接近, 呈圆筒形。刘弘墓玉樽的口径与高为10厘米, 体积约为普通樽器的一半甚至更小, 可能与玉材珍贵、玉料有限相关<sup>[17]</sup>。玉樽出土时, 据现场考古人员描述内有墨痕<sup>[18]</sup>, 笔者上手观察时, 确实看到樽内壁虽光滑坚密, 却有不规则的黑色浸渍, 已完全渗入玉石之中, 并在外壁发现一道黑色的渗迹。(彩版三, 1)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 或许暗示了西晋刘弘墓的这件器物, 虽然外形上保留了樽的形制和装饰, 但实际用途已经发生了改变; 墓葬中未出土与之配套的盖、勺或者承盘, 或进一步可以说明这件玉樽并非如其他铜、陶、漆樽等用作盛酒器或食物容器, 而极有可能已经演变成为文人书桌前笔洗或储墨容器一类的文房用具。

刘弘墓玉樽令人称赞的是其器表和器足雕刻的艺术形象。玉樽的足为熊的形象, 高仅2厘米, 却十分生动形象: 单腿下跪, 拱肩以承器身, 一手撑膝盖, 一手托器, 袒胸露乳, 低头咧嘴, 似在呐喊助力。以熊做器足亦见于其他樽器, 如河北邯郸张庄桥出土的东汉建武廿三年(47年)鎏金铜樽, 樽及承盘足均为熊形, 姿势、动作与刘弘墓玉樽如出一辙, 只是熊的身上还镶嵌水晶和绿松石<sup>[19]</sup>。(彩版三, 3) 同样姿态的熊除了做器足之外, 还见有独立的、体型稍大者, 推测可能为席镇之用<sup>[20]</sup>。(彩版三, 5) 玉樽器表雕刻的图案非常丰富, 其间有代表西

方极乐世界的西王母，手执瑞草与龙搏斗的羽人，及螭虎、龙、熊等各类在云海中穿越翻腾、相互决斗的动物。整套图案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是可以连续阅读的“场景式”纹样。这类规模的装饰题材多见于壁画、漆器，玉器上却极少表现，唯一可以想到的相似参考品是河北定县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玉座屏<sup>[21]</sup>。座屏上下透雕神话中的东王公和西王母人物，左右伴有跪状侍女，四周围绕着凤、鸟、龟、蛇、熊等各类动物形象。（彩版三，4）刘畅墓座屏是玉器中将人物与动物组合在一起，形成场景式描绘的最早实物，而刘弘墓玉樽应是这种复杂的场景式纹样在公元4世纪的进一步体现和发展。当然，亦不能排除玉樽受到了同时期其他材质器物装饰的影响，如甘肃嘉峪关毛庄子魏晋时期墓葬出土的一件木质奩盒，每片正反彩绘日月云气、飞马异兽及青龙白虎等各类动物互相追逐、奔腾飞跃的场景<sup>[22]</sup>。

值得思考的是，在坚硬的玉石上雕刻这类丰富、连续、有故事性的图案并非易事，它们能被“搬到”珍贵的玉石上，应具有深层次的重要意义<sup>[23]</sup>。可以肯定的是，纹样所代表的意境或描绘的场景在当时受到广泛喜爱和关注。比较刘畅墓座屏与刘弘墓玉樽，两者描绘的均是西王母类神仙人物以及祥云瑞兽的故事<sup>[24]</sup>，说明公元2至4世纪这类祥瑞图像在人们的精神领域内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因而才不吝工本，借助象征永恒的玉石加以体现。

## 2. 玉卮

刘弘墓另一件被称为“卮”的容器，通高12.9厘米，口径7.6厘米，底径7.8厘米，足高1厘米，器物出土时已破裂成九片，修复而成，斑沁严重，但从局部观察可见其原本的青玉质地<sup>[25]</sup>。器身呈长筒形，方唇，平底，三足，一侧中部有卷云形夔，夔面细线阴刻一简单兽面。器表外壁共分三层纹饰：口沿为环绕一周的四组浅浮雕纹，

呈横式“S”状，两端分别为龙首和凤鸟首。近底部一周云纹，间以三个兽面铺首，下承三蹄足。其余空间为主题纹饰，以勾连谷纹为地，浅浮雕两组螭虎凤纹，局部阴刻眼睛、爪纹等细节。螭虎站左上方，凤立右下方，两两相望。螭虎正面回首，一爪立于凤翅，爪下似抓小虫，凤则侧面回首对望，凤爪伸至器底。（彩版三，2）

刘弘墓出土的这件容器与樽不同之处在于筒的直径较小，上腹壁仅一单环夔，而非双环耳。这类容器体量较小，用指勾住夔，可以一手握持。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夫人墓发现两件自铭“卮”的彩绘漆容器，形制与此相似，只是平底无足<sup>[26]</sup>。河北满城一号汉墓铭“卮斝”的铜器，直筒杯形，腹部带一环夔，为卮形的铜灯<sup>[27]</sup>。这两件形制相近的带铭出土物可以帮助刘弘墓玉容器的定名，与此同时，《战国策·齐策》记录了一则有名的故事：

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请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终亡其酒<sup>[28]</sup>。

这则“画蛇添足”的寓言故事透露了当时饮酒器具的一些情况<sup>[29]</sup>。首先，“卮”是贵族门客的一种饮酒器；其次，这种饮酒器“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可见容升是一人饮量左右；再次，饮酒时卮可以一手把持，并且不是容易外溢的饮器，在争夺动荡中亦不会泼出酒液，可推测它应为深腹造型，不同于浅腹盏形的耳杯酒器。因而，根据考古材料和文献的双重佐证，刘弘墓的这件玉容器可确定为“玉卮”。

玉卮是一种名贵的饮酒器。《韩非子》载“千金之玉卮”，《史记·高祖本纪》录

“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殿前。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可见，玉卮被用于隆重的皇家庆典仪式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玉卮较为少见，到了北魏时甚至被认为来自于西域<sup>[30]</sup>。之后这种器物便消失了，一千多年后的明、清时期重新出现，并制作精美，雕刻繁复，如清代贵族少女黑舍里氏墓出土了明代“子刚”款的玉卮<sup>[31]</sup>，无疑是玉器中复古思想的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收藏了一件玉卮，高9.1厘米，青白玉带沁，被定为宋代<sup>[32]</sup>。玉卮的造型、大小与刘弘墓卮十分接近，长筒状，单环螯，器底三足，尤其是器足部分，亦为简洁的铺首图案，形象相似。（彩版三，6）玉卮器表素面无饰，抛光细腻，与刘弘墓玉卮有别，但六朝出土的其他玉容器较多为素面风格（详见下文）。因而，这件玉卮若非宋代的复古仿古之作，其年代可能更早，不能排除六朝时期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刘弘墓的“樽”与“卮”有以下三个区别：体积不同。卮小樽大，卮为长筒形而樽为圆筒形。耳螯不同。卮一般为单耳螯或圈形把手，樽一般为双耳。这也就决定了它们在功能上的不同，一个可以一手把持，直接做饮酒器，另一个容积较大，用作盛酒器或储食器，双耳的设计也更适合提拎。用途不同。玉卮仍为饮酒器而玉樽发展到六朝可能已经偏离了原来的功能。

## 二、其他玉容器

河南洛阳出土的白玉深腹杯，发现于正始八年（247年）的曹魏纪年墓中<sup>[33]</sup>，通高11.7厘米，口径5.1厘米，壁厚0.4厘米，直口平沿，筒身，长深腹，圈底短柄，带圈足，足高0.6厘米，径3.9厘米。足底中部有一小孔，深0.4厘米，径0.3厘米，并不穿透。玉杯通体呈青白色，玉质细腻润

莹，杯腹一周有白色玉花现象，整器制作规整精巧，通体光素无纹，抛光细腻，打磨痕迹肉眼难以观察。（彩版四，1、2）这类杯经常被称作“高足杯”，但实际上它的形制特点并非“高足”，而是细长筒身，长深腹，故笔者称其为“深腹杯”。如此大玉料、高品质的容器在魏晋南北朝玉器中难得一见，又出土于纪年墓葬，更是弥足珍贵。

这类直口平沿、筒身深腹、圈底圈足的玉杯形制比较特别，不见于后期墓葬中，而在秦汉时期多有发现。如陕西西安秦代阿房宫遗址<sup>[34]</sup>、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sup>[35]</sup>、岭南地区的广州西汉南越王墓<sup>[36]</sup>及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sup>[37]</sup>均有出土。同时，传世品中相近者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者<sup>[38]</sup>及近年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中出现的Junkunc III收藏<sup>[39]</sup>。（彩版四，3）最近有学者对这些玉杯的形制和纹饰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它们具有战国晚期的楚地风格，从而进一步推定曹魏纪年墓的白玉杯亦应属战国晚期之作<sup>[40]</sup>。这个推论有待商榷。阿房宫出土的玉杯说明迟于秦时这类玉器的制作已臻成熟，其细密的纹饰继承了战国的玉作工艺，并对上述汉墓的玉杯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还影响到其他材质的深腹杯，如江苏盱眙东阳西汉墓7号墓的漆杯，表面彩绘了各类繁复纹样<sup>[41]</sup>。公元3世纪中叶的曹魏墓白玉杯仍延续保持了这种筒形深腹的造型，却通体素面光洁，以美玉无纹取胜。虽然目前我们能在陕西咸阳马泉西汉晚期墓的深腹玉杯中找到这种朴素无饰的端倪<sup>[42]</sup>，（彩版四，4）但素面绝非战国或秦汉玉杯装饰的主流。曹魏墓的玉杯说明曾经盛行的繁复装饰此时已不再流行，或许与雕刻工艺的失传有关，也可能是审美口味的变迁。

同样的素面无纹亦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另两种容器——耳杯和玉盏。耳杯作为一种饮酒器，广泛流行于战国两汉，多为漆木、陶瓷制品，玉制的非常珍贵，也较少

见。美国温索浦玉器收藏和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 (Freer Gallery of Art) 的玉耳杯, 传出自河南洛阳金村大墓, 器表布满了细密规整的勾连云纹, 两侧桥耳镂雕纹饰, 内外底部都有细阴线刻<sup>[43]</sup>。(彩版五, 1) 到了汉代, 玉耳杯上仍有纹饰, 但不再密集, 如陕西西安三道巷出土的玉耳杯, 长腹外浅浮雕简洁的云气纹, 短腹两侧饰一对牛首<sup>[44]</sup>。而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的玉耳杯, 与同墓出土的其他有着精美雕琢的玉器不同, 通体抛光细腻, 光素无纹, 尽显玉质之美<sup>[45]</sup>。

魏晋南北朝继承了汉代的传统, 仍有不少耳杯出土, 并且多了新颖的式样, 如青海西宁北朝墓的耳杯杯身由一整块蚌壳加工而成, 口沿、桥耳则用金片制成<sup>[46]</sup>, 黄金装饰元素的加入应是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审美影响。又如这一时期的釉陶、青瓷以及铜器中经常出现口衔耳杯的动物雕塑<sup>[47]</sup>。(彩版五, 3、4) 有趣的是, 动物身上雕刻着繁复纹样, 而口中衔着的耳杯往往简单素面, 暗示着此时期耳杯朴素无饰的特点。因而,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两件玉耳杯均是素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1951年安徽芜湖月牙山3号墓出土一件, 长径17厘米, 短径9.8厘米, 宽13厘米, 高4.8厘米, 抛光细洁<sup>[48]</sup>。(彩版五, 5) 另一件发现于公元5世纪的高句丽(今朝鲜)古墓, 长13厘米, 宽9.5厘米, 高3.2厘米, 新疆和阗白玉制成, 这种造型和原料的玉耳杯, 应是从中原地区输入高句丽并在贵族阶层中流行使用<sup>[49]</sup>。

另一件魏晋南北朝玉容器是玉盏, 出自北燕的冯素弗墓, 通体光滑, 底略向内收, 浅圈足, 形似浅碗, 高仅3.3厘米, 故称为“盏”<sup>[50]</sup>。玉盏亦是素面, 仅口沿处饰弦纹一周, 与同墓出土的琉璃盏形制十分相类, 可能是玉工模仿玻璃器皿而制。(彩版五, 2) 隋唐玉器中进一步大规模出现模仿金银器皿的制作, 这种世俗化的倾向并非灵感突

发, 而应该启蒙自魏晋南北朝时期<sup>[51]</sup>。

- [1] 该容器的玉质特别, 呈奶白色, 未经抛光, 似未上釉的洁白素胎, 但质地坚密, 重量与玉石相当, 属何种玉料还需进一步考证。安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文物, 1993, (11)。
- [2] 从图像学角看说, 该人物符合“西王母”的形象特征, 并与东汉河北中山王刘畅墓出土的玉座屏中的“西王母”图像和场景相似。
- [3] 杨伯达主编·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9·玉器·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106, 图一九四。
- [4] 吕大临在《考古图》中定名四件器物为“奩”: 一件铜“凤奩”, 一件铜“携奩”, 一件“玉奩”, 另一件为“涂金奩”。分别见: 吕大临·考古图·卷十: 页十八, 十九。续考古图·卷一: 页十八; 卷二: 页七。(南京: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清刊本影印, 1991.)
- [5] a. 郭勇·山西省右玉县出土的西汉铜器·文物, 1963, (11)。  
b. 张希舜主编·山西文物馆藏珍品·青铜器·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5: 119, 120, 图183, 图184。
- [6] 孙机先生指出“温”字并非“加温”之意, 而是通假“酝”字。“酝酒”是汉代一种反复重酿多次, 酒味酽冽的美酒, 常作冷饮, 故这类筒形精美器的确切定名应为“酒樽”, 是盛放美酒的容器而非温酒器。见: 孙机·释“清白各异樽”·文物天地, 1987, (2)。汉晋时期的温酒器是炉, 而非樽。见: 陈定荣·酒樽考略·南方文物, 1989, (1)。
- [7] 邯郸市文物研究所编·邯郸文物精华·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0: 图90。孙机1987年的文章中未提及这条资料。
- [8]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第四》: “……(女)乃自杀, 阖闾痛之, 葬于国西阊门外, 凿池积土, 文石为椁, 题凑为中, 金鼎、玉杯、银樽、珠襦之宝, 皆以送女。”见: 赵晔·吴越春秋·台北: 世界书局, 1967: 97, 98。
- [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135, 图九十一。
- [10] Max Loehr, Ancient Chinese Jades from the Grenville L. Winthrop Collection in the Fogg Art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Fogg Art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No. 521.
- [11]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1: 189, 图一二〇(A)(B), 彩版一一:

- 1.
- [12] 樽在汉代广泛发现。见：陈定荣．酒樽考略．南方文物，1989，(1)．
- [13] 1916年考古发掘的乐浪石岩里9号墓出土了铜樽，高20.8、径24厘米。见：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乐浪．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2001：110，图99．
- [14] 孙机．释“清白各异樽”．文物天地，1987，(2)．
- [15] 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4)．
- [16]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9)：20，图四二~四三．类似的壁画在汉晋的画像石或画像砖中广泛存在，这里只是举了其中一例。
- [17] 同样的情况亦见温索浦玉樽，通高7.7厘米，口径11.2厘米，见[10]。
- [18] 雷明，雷芬．安乡清理西晋刘弘墓．中国文物报，1991-08-18(1)．
- [19] 邯郸市文物研究所编．邯郸文物精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图90．
- [20] 该鎏金铜熊高7.6厘米，身上有阳线刻的水波纹以表现皮毛。Fine Chinese Ceramics, Jades and Works of Art (New York: Christie's, September 19, 2007), lot 217. 大小相近者亦可见 Eskenazi Ltd.,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and Gilt Bronzes from the Wessén and Other Collections (London: Eskenazi, 1980), No. 22.
- [21] 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11)：图版壹．
- [22] 孔令忠，侯晋刚．记新发现的嘉峪关毛庄子魏晋墓木板画．文物，2006，(11)．
- [23] Jessica Rawson, "Commanding the Sprits: Control through Bronze and Jade", in Chinese Bronzes: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3-2000 (Hong Kong: Orientations Magazine Ltd., 2001), p. 299.
- [24] 关于祥瑞图像的定义，并在其他材质上的体现可参见：王涛．汉画像石墓祥瑞图像研究．载：南京市博物馆编．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南京历史文化新探(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75~186．
- [25] 碎片接缝处留有黄色粘胶痕迹，非为沁色。
- [26] 两件漆卮高11厘米，径12厘米，彩绘，底部刻铭“女阴侯卮容五升，三年女阴庠己工年造”。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8)．
- [27] 《说文解字》：“铉，铉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72，图四九之1．
- [28] 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56．
- [29] 王振铎对此有很好的阐述，见：王振铎．论汉代饮食器中的卮和魁．文物，1964，(4)．
- [30] 《洛阳伽蓝记》提到北魏河间的豪富王元琛，家中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盘、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见：杨銜之．洛阳伽蓝记·卷四．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6：七．
- [31] 苏天钧．北京西郊小西天清代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3，(1)．
- [32] T. T. Tsui Galleries of Chinese Art, Royal Ontario Museum: The T. T. Tsui Galleries of Chinese Art (Toronto: Royal Ontario Museum, 1996), No. 81.
- [3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4)：图版肆之6．
- [34] 刘云辉．陕西出土东周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台北：众志美术出版社，2006：219~222．
- [35] 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8)．
- [36]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203，图版一三二．
- [3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9)．
- [38] 钱伊平．汉玉杯．故宫文物月刊，第100期(1991)：28．
- [39] Alfred Salmony, Chinese Jade through the Wei Dynasty (New York: Ronald Press Company, 1963), plate XV: 2. 纽约佳士得拍卖公司2006年将这件玉杯拍出，见：Fine Chinese Ceramic and Works of Art (New York: Christie's, September 19, 2006), lot 175.
- [40] 杨建芳．论三件玉杯的年代、产地及其他相关问题．故宫文物月刊，第306期(2008)：76~83．
- [41] 深腹漆杯外表漆黑，朱绘云气纹、几何云纹、菱形纹、圆圈及锯齿纹。通高18.8厘米，口径7厘米，足径5.8厘米，尺寸较大，或与材质有关。见：南京博物院．江苏盱眙东阳汉墓．考古，1979，(5)：417，图五之5．
- [42] 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考古，1979，(2)：127，图四之11．
- [43] 梅原未治编．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京都：小林出版部，1943：100~102．哈佛大学温索浦玉器收藏一对，藏品号为1943.50.634，目前网站上定为西汉时期。弗利尔美术馆藏一件，藏品号为F1931.19目前网站上定为战国时期。

- [44] 李凯, 王建玲. 话说玉耳杯——“觴”、“羽觴”、“耳杯”的关联. 文博, 2007, (5): 34, 图 1.1, 36, 图 1.2.
- [45] 中国国家博物馆, 徐州博物馆编辑. 大汉楚王: 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213.
- [46] 卢耀光等. 青海西宁市发现一座北朝墓. 考古, 1989, (6): 571, 图三之 7.
- [47] 陶质的如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出土的陶兽衔耳杯. 见: 山东邹城市文物局. 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 文物, 2005, (1): 21, 图四七. 铜质的如江苏南京仙鹤观 M6 (高埋墓) 及河南巩义站街晋墓出土的铜兽衔耳杯, 见: 南京市博物馆. 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 文物, 2001, (3): 10, 图一七.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河南巩义站街晋墓. 文物, 2004, (11): 41, 图三. 还有

玄武衔耳杯的造型, 见: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崇庆县文化馆. 四川崇庆县五道渠蜀汉墓. 文物, 1984, (8): 47, 图五, 图八. 对于这些兽衔耳杯造型器物的用途, 有谓之砚滴、水注、烛台或插容器, 未有定论.

- [48] 古方主编. 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16.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166.
- [49] 罗宗真著, 任谷孝之译. 魏晋南北朝: 融合する文明. 大阪: 创元社, 2005: 236, 图 385.
- [50] 黎瑶渤. 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 文物, 1973, (3): 21, 图二四.
- [51] 卢兆荫, 古方. 略论唐代仿金银器的玉石器皿. 文物, 2004, (2).

(责任编辑: 辛 革)

(上接 82 页)

凌负罗遗之飧, 加璧焉。重耳受其飧而反。【简 94】其璧。及重耳反晋国, 兴军伐曹。【简 95】

这里有两点需先作说明。第一, 简文之“凌负罗”在《左传》、《国语》等书中作“僖负羈”, 而在《韩非子》、《史记》以及上引《淮南子》等书中作“厘负羈”。凌、僖和厘上古音十分接近, 故此三字当属通假关系。罗、羈二字字形相近, 故简文之“罗”很可能是“羈”之误字。第二, 简文之“飧”, 原形作“𩚑”, 整理者在前引释文中释为“餐”, 不确。“飧”字《说文》小篆作“𩚑”, 字形可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和《国语·晋语四》中亦皆作“飧”。《孟子·滕文公上》: “糗飧而治。”焦循《正义》: “飧、馐古通用。”《广雅·释器》: “熟食谓之馐。”王念孙《疏证》: “馐, 读若飧。”可见简文之“飧”字与《淮南子·道应》相对应之“馐”字相通。

简文重新编排后, 与《淮南子·道应》所记内容十分吻合, 所不同者仅是简文中“凌负罗之妻胃(谓)凌负罗曰”出现了两

次。而且, 缺字据《淮南子·道应》补足后, 前五枚简正好每枚上面都是 16~17 个字, 亦说明如此排序当属不误。至于最后的简 95, 据《淮南子·道应》所记内容推测, 下部当残缺掉四五字, 而其后应仍缺失一枚简。

前文所指出的整理者在注释方面出现的问题, 究其原因, 很可能正是与对竹简的编排次序错误有关。

附记: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二五”基地重大项目“甲骨文语料库建设”(项目编号 11JJD740001)的中期成果之一。

- [1] 韩自强. 阜阳汉简《周易》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2] 同 [1]: 187.
- [3] 同 [1]: 183, 204.
- [4] a.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407.  
b. 徐元诰. 国语集解.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327.

(责任编辑: 辛 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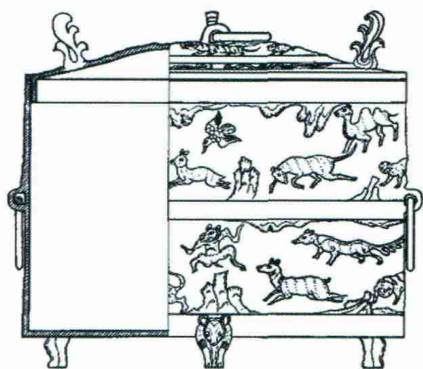




1. 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出土玉樽  
(《中国文物精华1993》)



2. 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出土玉樽  
(《中国文物精华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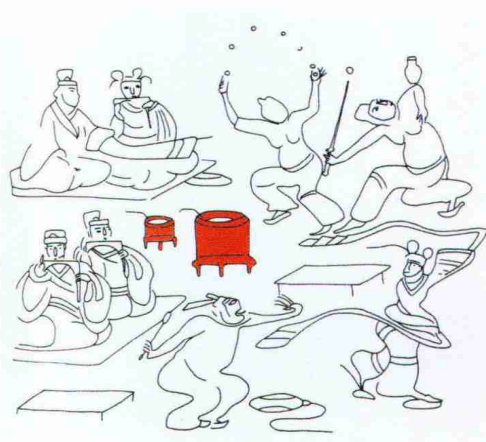
3. 山西右玉县出土汉代铜樽线图  
(《文物》1963年第11期)



4. 美国哈佛大学温索浦玉器收藏金玉樽  
(笔者摄于福格美术馆展厅)



5. 朝鲜乐浪郡出土铜樽 (《乐浪》)



6. 宴饮场景示意图 (《乐浪》)





1. 刘弘墓玉樽器表局部 (Chinese Bronze: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3-2000,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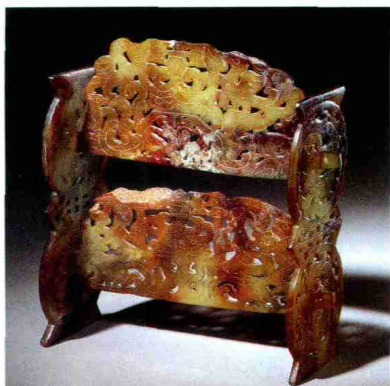


2. 安乡西晋刘弘墓出土玉卮  
(笔者摄于常德市博物馆展厅)



3. 邯郸东汉建武廿三年墓出土鎏金铜樽  
(《邯郸文物精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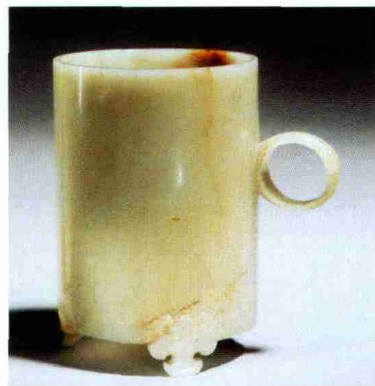
《六朝时期的玉容器》  
——樽和卮



4. 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玉座屏  
(《中国玉器全集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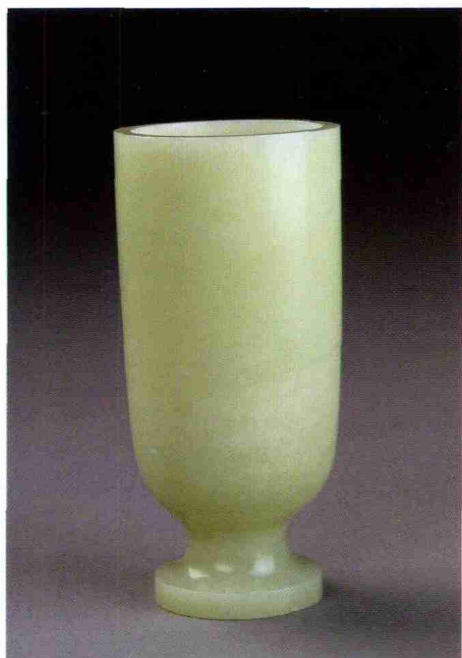


5. 鎏金铜熊 (Fine Chinese Ceramics, Jades and Works of Art, New York: Christies)



6.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省博物馆藏玉卮  
(Royal Ontario Museum: The T.T. Tsui Galleries of Chinese Art)

## 彩版四



1. 洛阳正始八年墓出土白玉深腹杯  
(洛阳市博物馆高西省先生提供)



2. 洛阳正始八年墓出土白玉深腹杯  
(洛阳市博物馆高西省先生提供)

### 《六朝时期的玉容器》 ——深腹玉杯



3. 西方私人收藏深腹玉杯 (Fine Chinese Ceramic and  
Works of Art, New York: Christies)



4. 咸阳马泉西汉墓出土深腹玉杯  
(《陕西出土汉代玉器》)





1.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耳杯  
(《洛阳金村古墓聚英》)



2. 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琉璃盏  
(《文物》1973年3期)



3. 邹城西晋刘宝墓出土釉陶兽衔耳杯  
(《中国出土瓷器全集6》)



4. 南京高悝墓出土鎏金铜兽衔耳杯  
(《六朝风采》)



5. 芜湖南朝月牙山3号墓出土玉耳杯  
(《中国出土玉器全集6》)

《六朝时期的玉容器》  
——耳杯和盏